

近代中国买办的卑微心理分析

陈国威

(南京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92)

[关键词] 买办; 环境; 出身; 卑微心理

[摘要] 买办在近代中国新式企业活动中一直是一个活跃的也是最富有的群体。但买办一直“耻言身份”, 他们存在着一种卑微心理, 这种心理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出身有密切关系。这种心理的给买办们的事业带来极大影响, 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中图分类号] K25; F71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7)12-0052-05

Exploration on Humble Mentality of the Comprador in Modern China

CHEN Guo-w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2 China)

Keywords: comprador; environment; personal origin; humble mentality

Abstract: The comprador is one of the most wealthy classes in modern china, and has always worked particularly vividly in Chinese modern style business enterprise. But we can also find that they were shy to admit their social status. They had the humble mentality tha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lower origi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n them at that time. Their humble mentality affected their business, and also prevented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买办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社会群体, 它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直是学术界重视的课题。但前期研究多侧重其经济活动, 且理论基础多以阶级分析见长, 基本未超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范围^①。至于买办的主观世界、心理(态)层面, 研究者缺乏应有的关注。笔者拟从心理角度尝试进行分析探究。

一 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

近代中国的买办并非凭借高官厚爵、名门望族、书香门第显赫于世, 最初引人关注的是他们在工商业方面的经营才能, 随后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其暴发及富有。“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 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1] (卷1)}“为洋务者无不起家巨亿”,^{[2] (p26)} 哪怕连宗教人士也会因作买办而“积巨资, 多成一时之豪富”^{[3] (p12)}。是什么使买办如此迅速地积赚财富? 清政府一贯闭关锁国、轻夷重夏, 国门初开之时, 国人对对外贸易缺乏认识, 加之地域因素、制度原因及传统的贱商、贱夷观念, 都极易造成初涉外贸之人对此的垄断, 对外贸易人员的暴富也因此成为可能, 而买办恰好就是鸦片战争后这个特殊时期对外贸易的受

益者。“自道光以来, 操其术者, 皆起家亿万”^{[3] (p3)}, 买办中可谓富者如云:“富甲王侯”的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徐润(1838~1911年)资产600万元; 汇丰银行(Hong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吴懋鼎(1850~1927年)财产达750万元; 天津“四大买办”之一的天津怡和洋行买办、号称天津商埠“买办之王”的粤人梁炎卿, 资产竟高达2000万元; 怡和洋行杨坊(?~1865年)亦“豪拥家私数百万”; 上海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亦骤富”, 同乡中咸有“快发财之名”; 叶澄衷在1899年去世时资产达八百万两。此外, 拥有财富估计在500~1000万银元之间的, 还有长期担任汇丰银行买办的苏州洞庭席正甫家族、东方汇理银行朱志

① 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黄逸峰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汪敬虞:《唐廷枢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美)郝延平著, 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汪敬虞:《试论近代中国的买办阶级》, 《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 汪熙:《买办和买办制度》, 《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 丁日初、杜恂诚:《买办与洋务企业》, 《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刘广京:《唐廷枢的买办时代》, 《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等。

尧、怡和洋行祝大椿、汉口怡和洋行刘子敬等。各学者对买办群体的整体财富推算如下：严中平认为买办群体在 1890~1913 年总收入为 6.2 亿多关两^{[4] (p41)}；黄逸峰 1840~1899 年间买办的收入为 4 亿关两^{[5] (p69~70)}；汪熙认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到抗战前夕，买办收入达十五亿二千九百万美元”^{[6] (p324)}；王水估计 1840~1894 年间买办的职业所得为 5 亿两^{[7] (p168~173)}；郝延平则估计，“1842~1894 年间买办的总收入（包括当买办和自己独立经商所得）约为 53 000 万两”^{[8] (p129)}。

追逐财富是人的一种天性，曾几何时，“其黠者，旦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若鹜，举国若狂”^{[3] (p12)}。但事实上，这群“于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的群体，虽拥有巨额财富，却耻言自己的买办身份。这不仅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麻烦（难以辨别人物身份），也使人们产生一份疑惑。实际上，这群买办不仅拥有巨富，而且还有像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容闳等一流的企业家、思想家，有像郑观应、曾继圃（宝顺洋行）、丁建昌（贝德福洋行）等“文字极佳”的秀才、儒士。当时社会亦有崇“洋”之风：“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重楼曰洋楼，彩轿曰洋轿，衣有洋绉，帽有洋簏，挂灯曰洋灯，火锅名为洋锅，细而至于酱油之佳者亦名洋秋油，颜料之鲜明者亦呼洋红洋绿。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9] (p52~53)} 独洋行买办不以此为荣。这一群体有其独特的社会心理。容闳（曾为宝顺洋行买办）的话能对我们有所启发：“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予固美国领袖学校之毕业生，故予极重视母校，尊之敬之，不敢使予之所为于母校之名誉少有辱没。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10] (p4)}

二 社会现象的分析

心理学研究者认为，任何心理活动都是人们对其生存环境的一种反映。群体的社会心理则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互有影响的主体反应，“社会心理反应的内容和方式，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活环境”^{[11] (p33~34)}。近代中国开埠之初，“在粤夷商，往往被民人蔑视，气不得舒”^{[12] (p27)}。如“1845 年 3 月 18 日，香港殖民财务官马尔丁，英国副领事杰克逊（Jackson）和随军牧师士丹顿（Stanton），当在广州北面的城墙上散步的时候，被一些挥刀、舞剑的人们所殴

打，这些人向他们方面投掷巨石并且叫喊‘杀呀！杀呀！’”^{[13] (p422)} 而且，普通群众“本与夷人不协”，“积习相沿，牢不可破”^{[12] (p3093)}。由于当地人民的抵制，“该蛮夷一有举动，即在各地响起警钟同心协力，一鼓作气，杀尽叛夷寸草不留，不容蔓延”^{[13] (p446~447)}^①。使得有意到广州的外商久久不能跨入。传教士卫三畏曾提到他在广州传教时的经历：“一路上我觉得沿街店铺里有很多人都在咒骂我，就像对待所有他们仇恨的外国人。我听到他们说‘杀了他’、‘洋鬼子’。”以致卫氏在日记里产生这样的念头：“通过战斗，他们（笔者按：指中国人）还能学到许多东西，包括如何平等如朋友般地对待外国人。”^{[14] (p96,157)} 不仅“夷人”被搞得诸多地方难以立足，就连为洋商效命的中国人亦常被人殴打、唾骂，甚至致死。如厦门怡和行一个买办陈庆真（音译，ch'en ch'ing-chen）与一些社会闲杂人员被当地官府收押并折磨致死，其间怡和行曾试图赎救，但未成功。其后尸体被其于怡和行门前，以示羞辱^{[15] (p410)}。而教案的不断出现，正是华洋关系紧张、彼此敌视的结果。

19 世纪的中国社会，人们尚处在天朝独尊社会心态中，“抵制西方的开门咒的，不仅有官僚，而且有整个社会”^{[16] (p254)}。“明华夷之辨”，“轻夷”、“贱夷”是当时中国民众的普遍社会心理。1875 年郭嵩焘奉朝廷之命为中国驻英公使，他的许多友人都替他感到沮丧。李鹤年和冯骥极力劝他不要去蛮夷之邦，李慈铭在他的日记里为这件事感到伤心：“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17] (p210)} 在近代中国士大夫眼里，对带着政治任务的无可奈何的“公派出国”尚且无法容忍，对于那些在中国土地生活、成年累月与高鼻蓝眼的外国佬厮混的买办，更是目下之、唾弃之。“其人（买办）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遁逃藪；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招下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经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类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18] (卷三)}。“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19] (p55~56)} 林则徐甚至说“买办

① 有关反外记录，可参考该书第十四、十五、十六章。

等本系汉奸”^{[20] (p35)}，两江总督裕谦也持此见：“买办者实为汉奸之尤。”^{[21] (p62)}（此两处所指虽为鸦片战争前之买办，但已有近代买办之意义，如鲍鹏）汇丰银行买办吴调卿虽捐了候补道，但就因为买办，“被人奏参以为让买办作官乃朝廷之耻，结果被摈，不得同众官们一起辕期稟见”^{[22] (p77)}。甚至是寄西人檐下、以西方货为尚、与西人接触较多的王韬也对买办颇有成见，“以其为西人供奔走，美其名曰买办，实则服役也”，而拒绝把女儿嫁给买办姚某为妻。^{[9] (p333)}^① 唐廷枢在会办轮船招商局时已脱离洋行，并运用其“丰富而广阔的经验”为国家效力（“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但他及两位同事郑观应、徐润仍受到马建忠等人的质疑：“唐（廷枢）、郑（观应）、徐（润）诸人皆该商（怡和洋行）素所蔑视之买办，一旦与之抗衡，犹挟主奴之见，所以售地、租埠以及引用总船主犹有主奴之见存也。”^{[6] (p305)} 都市普通民众则以二毛子、洋奴来称呼买办。总之，从上层官员到平民百姓对买办都普遍带有一种憎恶的情绪。一句话，“食夷利者贱”！

心理学研究者认为，别人的行为和态度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是自我评价的“一面镜子”。^{[23] (p4)} “当面对似乎有敌意和有支配力量的人时”，人们“就产生了自卑感”。一代译才严复就有过这样的际遇：“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鬻蚕。”^{[24] (p861)} 此语真实地反映了严复因学了洋文（旁行书）而受到士大夫冷眼时内心苦闷的心情。文人寄失意于字里行间，买办则将这份卑微心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一些反常的日常行为来表现之。德国禅臣洋行（Siemssen & Co.）的买办严蕉铭就曾因一个新到中国来的德籍职员直呼其为买办而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有意侮辱而提出抗议。^{[25] (p266)} 马建忠的外甥朱志尧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的买办，同时也是上海新机器造船厂的老板，在目前所见的他的一张名片中，上面印着如下十项职衔：“教皇钦赐圣西尔克斯德贵骑尉勋位；三等嘉禾章；上海总商会费城赛会代表；上海公教进行会副会长；上海华商电气公司董事；上海大通轮船公司董事；上海新机器造船厂董事；安徽宝兴铁矿公司董事；上海新洋制造机器厂主任；上海同昌纺纱榨油公司主任。”^{[26] (p11注③)} 唯独回避了他东方汇理银行华经理（即买办）的名头。由此不难看出，不管是

买办自身还是他们周遭的环境，始终未把买办纳入上流社会，尽管有些曾是“有面子的人”^②，但其荣宠仅局限在一定的圈子内。

钱财的富有只改变了买办们的经济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始终没有质的提高。因此，一方面为满足内在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及行事的方便，买办们想方设法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士绅阶层居四民之首，是封建社会的权力阶层，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厕身缙绅之列”自然成为买办的追求。而清政府也为买办的捐官纳职提供了方便。如光绪二十年曾规定，由监生、附生捐贡生要银 144 两，由增生捐贡生 120 两，由廪生捐贡生 108 两；由俊秀捐监生 108 两，由附生捐监生 90 两，由增生捐监生 80 两，由廪生捐监生 60 两。捐职衔的，道员 5 248 两，知府 4 256 两，郎中 3 840 两，盐运司同 3 840 两，同知 2 000 两，通判 1 600 两，光禄寺署正 900 两，州同等官 300 两，州判等官 250 两，县丞等官 200 两，县主簿等官 120 两，从九未入流 80 两，捐花翎三品以上 2 000 两，四品以下 1 000 两，蓝翎 500 两。^{[27] (p59-78)} 这点费用对于“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的买办而言，简直如九牛一毛。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杨坊、徐钰亭（徐润的伯父，宝顺洋行买办）等人都捐有道台衔。1872 年徐润还捐了比道台更高等级的兵部郎中衔，汇丰银行的席正甫受二品衔红顶花翎加捐道台，怡和洋行祝大椿也是二品顶戴花翎道台，平和洋行朱葆三捐三品衔候选道员，天津怡和洋行梁炎卿捐头品职衔，天津华俄道胜银行王铭槐曾捐候补道又加捐二品职衔。^{[28] (p184-185)} 当然，这些捐纳而来的头衔绝大部分是虚衔。但在官本位的社会里，买办们以资财捐纳职衔翎顶提高了社会地位，弥补了内心的卑微^③。不仅如此，后期买办甚至在称谓上有所改变。20 世纪开始，买办自称或买办之间一般已改叫做华经理或华账户。名称的改变不仅因为国人对为洋人办事的买办深恶痛绝，也说明“华帐户、华经理两个名词的创造，反映买办自己的耻于被称为买办，而以这些名词自

① 钱钟书小说《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 页）里说方鸿渐虽是留洋回来的，但仍不愿与买办这种俗物往来。

② 如伦昌、顺昌、琼记洋行买办阿洪、唐隆茂曾被洋东称之为有面子的人。

③ 买办捐官纳职，或有谋取更大利益的可能。

娱”。^{[25] (p265~266)}

买办与洋行之间是一种雇佣关系, 尽管没有中国助手外商做不成生意, 但在洋人眼中, 买办就是佣人, 可以随意斥责, 甚至在蚊帐里发现一只蚊子, 也要半夜三更的把买办找来加以斥责。^{[8] (p79)} 这种主雇关系无形中更加重了买办们的卑微心理。康有为也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这一点: “吾华人百万之富, 道府之衔, 红蓝之顶, 乃多为其一洋行买办, 立侍其侧, 仰视颜色。”^{[6] (p332)} 多得洋人称赞的唐廷枢可说是华商的领袖人物, 然而他在老板的面前却以“佣人”自称。^{[29] (p143, 114)} 诚如马敏先生所言: “在买办身上……更多地表现为奴才对主子诚惶诚恐、惟命是从的卑下情绪。”^{[30] (p13)}

心理分析学家告诉我们, 人们在童年所遭受的创伤可能在今后的成长中被逐渐拂平, 但永不会断根。早期的买办大部分是由帮洋商买办食物、管理家务的身份转化而来的, 再加上中国传统夷夏观念的影响, 体面人是不屑做买办的, 正所谓: “师事夷人, 可耻孰甚。”只有那些“郁郁不得志, 或贫无聊赖之徒, 既无可托之枝栖, 则亦始妄为之”^{[31] (p38)}。事实上, 诸多买办少年时期的生活境况非常不好。郑观应“家穷服贾”, 居身买办; 徐润“家暴贫”; 朱葆三, 幼时家穷, 14岁只身到上海学艺; 刘鸿生出生于平民家庭, 17岁时辍学自谋生路; 唐廷枢虽“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 但最初也只是在一家拍卖行当职位很低的助手; 吴懋鼎原是外轮的跑舱, 后在上海给英人赶马车; 新泰兴洋行的宁星普是兴济镇编草帽辫的; 仁记洋行李福臣原来是一个摆小钱摊的; 而新泰兴洋行一个沈姓买办竟是贫苦道士还俗的。可见大部分“洋行买办、细崽”是“迫于贫寒而佣于异域”。低贱的出身成为买办永不断根的童年创伤, 造成了他们永远的痛。

父子相继、祖孙相袭的买办甚多, 当时出现了许多买办世家。香山的唐廷枢家族、宁波的王铭槐家族、苏州洞庭的席正甫家族、吴少卿家族、丁志乾家族等, 都连续三代分别担任怡和洋行、汇丰银行、瑞记洋行(Arnold Karberg & Co)、锦隆洋行的买办。容星馨家族则连续四代任香港麦加利银行买办。若买办内心果真有着挥之不去的卑微情结, 那么为何他们不教育、敦促其子女回归“正途”? 反而在其后人中前赴后继继续从事买办行当的仍不乏其人呢? 分析原因如下:

第一, 在心理上, 从小接触的西化教育使这些买办子女更认可西方文明甚至倾向于西化的生活, 被冲淡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越来越浓的西化思维使他们根本不会理解国人“师事夷人, 可耻孰甚”的目光。早期儒家传统的“师夷耻甚”思想还占据着买办的头脑但随着接触洋商之久, 参与洋务之深, 买办必然看到西方文明的一些优秀之处, 买办们多数对其子女输以西化教育, 至少是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如徐润“五公子现在岳士佛学习政治法律科”; “四公子曾往美国游学”; “女公子与媳妇”则对于英语“均能娓娓应对”, “且绝无半点可厌之洋泾滨英语”; “四位小孙亦学习英华文字, 谓俟其长成, 拟送往英国读书”。^{[32] (p233)} 后期的刘鸿生也先后将他的 11 个子女送英、美、日等国留学。^{[33] (p98)} 第二, 随着清政府的日益疲敝, 外国势力愈加骄横跋扈, 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 这促使买办及其自身的产业对洋人的依附性越来越强。各买办家族多是沿袭一家洋行或一个专业的洋行的买办职位, 就为此提供了佐证。久之, 买办们难以(或不愿)离开洋行、脱离买办身份。第三, 买办家族已经习惯的奢侈生活必须依仗买办优厚的经济收入加以维持^①。养尊处优的生活使这些少爷小姐们不仅无法体会父辈早年仰人鼻息、动辄遭斥的屈辱, 相反, 优越的物质条件, 加之社会上愈演愈烈的“贵西贱中”的风气, 更加深了他们作为富家子弟的优越感, 同时也加重了他们的亲洋心态。同时, 这种优越的物质条件又使他们其他的谋生能力退化, 只能依赖买办这一途径^②。这样看来, 买办世家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在近代买办存在的整个阶段, 卑微心态是日渐淡出的, 近代初期最为突出, “耻言身份”是其最典型的表现, 捐官之踊跃亦是一个隐性的表象。随着买办对洋行商业生活参与的日益深入, 加之剧变时期日新月异的时代内涵、社会价值评价标准的变化, 以及后继

① 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一书中认为书吏、衙役等卑微之人仍想亲人相传地控制其位, 仍是出于经济报酬之动机。可为我们提供相关参考。

② 如梁炎卿之子梁赞奎就因做官不顺利, 当大地主也不成, 而最终又走上买办之路的。见梁佩瑜:《天津怡和洋行及其买办梁炎卿》, 天津政协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89~90 页。

者对买办生活的重新理解,原有的卑微心态也逐渐消弱。

三 结 语

历史是人创造的,“对社会与历史过程的分析,必须要从人开始,并非抽象的人,而是真实、具体的人,由人的生理与心理性质开始分析”^{[34] (p174)}。“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35] (p245)}现在在我们分析买办的心理,是因为买办在近代中国由于“通晓洋务、商务”而参与了中国艰难的工业化进程,开始了“他们(买办)为新式工商业引入中国的成果负责”^{[36] (p42)}的历程。因此,了解买办的情况无疑对我们了解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有所帮助。解析买办的心理并不是为了批判。虽然一度“买办”已成为中国半殖民化的代名词,但我们必须客观正视买办曾参与中国近代化构建的史实。社会学有个专有术语叫“文化资本”,指一种包括人格、品质、威信、信心等内容的象征性资源。这种资源在商业运行中具有很大作用。事实上,在当时中国那样比较讲究伦理价值观的社会里,人际、人情、人格等非正式因素在建设中所发挥作用可能就更大。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创立之初,李鸿章虽给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很大的权力,也很支持他们,但李氏对其不是十分信任:“美使宜添派容纯甫(按:指容闳),为其熟识洋情,语言文字,较荔秋(按:指陈兰彬)差强,但其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唐景星(按:即唐廷枢)与纯甫等耳。”^{[37] (卷17)}我们把买办称作“中国近代史上使中国建立实业的重要力量”、“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源泉”^{[38] (p12)},而这个力量的文化资本竟如此之弱!这是否预示中国民族资本的软弱和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

研究历史时,我们一直在注意史料扎实、评价客观。但我们不能忽视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虽然社会心理分析不是历史问题的完整答案,但可为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也许心态史的分析正是对史料的一种另类文本的解读。

参考文献:

- [1] 王韬. 瀛壖杂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2] 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 [3] 聂宝璋. 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 [4] 严中平. 中国棉纺织史稿[M]. 北京: 科学文献出版社, 1963.
- [5] 黄逸峰等. 旧中国的买办阶级[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6] 汪熙. 关于买办和买办制度[A]. 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 [7] 许涤新, 吴承明主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2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8] (美)郝延平. 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 [9] 陈作霖. 炳烛里谈: 卷上[Z]. 转见李长莉. 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近代化[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 [10] 容闳. 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5.
- [11] 沙莲香. 社会心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1987.
- [12] 齐思和等整理.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 [13] (美)马士.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1卷[M]. 张汇文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 [14] (美)卫斐列. 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M]. 顾钧、江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15] John King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16] (英)季南著. 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M]. 许步曾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17] 郭廷以. 郭嵩焘先生年谱: 第2册[Z]. 转见费正清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8] 李鸿章. 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A].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 奏稿[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3.
- [19]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 [20] 信及录[Z].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46.
- [21] 梁廷枏. 夷氛闻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2] 毕鸣岐. 天津的洋行与买办[A].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38辑[C].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
- [23] 周晓虹. 现代社会心理学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 [24] 严复. 送陈彤甫回闽[J]. 王栻主编. 严复集: 第2册[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25] 严逸文. 四十年买办生活回忆[A].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42辑[C].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
- [26] 王芸生, 曹谷冰. 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A].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C].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下转第117页)

- 改称中山公园的公函[Z]. 1929-05-22. 青岛市档案馆 B0038—00478.
- [44] 吕锡珍. 淳溪古镇一条街[A]. 高淳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等. 高淳史志资料(5)[Z]. 1985.
- [45] 威海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威海市志[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
- [46] 洪卜仁. 方红菱. 抗战时期厦门大事记[A]. 政协厦门市文史委员会. 厦门文史资料(12)[Z]. 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专辑, 1985.
- [47] 长春市政府训令(35)社区安第 264 号, 吉林省长春市档案馆 历 23-1-29. 转引自霍燎原、崔国玺. 从沦陷到解放——1931 年至 1948 年的长春[Z]. 即. 长春文史资料(2)[Z]. 1995, (8).
- [48] 鞍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鞍山市志·城乡建设卷[Z].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92.
- [49] 哈尔滨市南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南岗区志[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1994.
- [50] 朱天顺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台湾省[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51] 彰化市政府编印. 彰化市概览[Z]. 台湾, 1947.
- [52] 湛江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 湛江市地名志[M]. 广州: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89.
- [53] 王蕴珊. 回忆秦安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会[A]. 政协甘肃省天水市文史委员会. 天水文史资料(3)[Z]. 1989, (4).
- [54] 李英敏. 五月的鲜花(回忆录)[Z].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
- [55] 徐怨宇. “一二·九”在武采访纪实[A]. 政协武汉市文史研究委员会. 武汉文史资料[Z]. 1984(2).
- [56] 曹聚仁. 南京印象[A]. 孙季叔编. 中国游记选[M]. 上海亚细亚书局, 1934-9. 转自. 丁帆选编. 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Z]. 北京出版社, 1999.
- [57] 陈畴. 郁林与贵县[J]. 旅行杂志, 12卷9号, 1938-09-01.
- [58] 紫阳市规程[A]. 苏州中学总部编印. 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训育规程[M]. 1930年重订本.
- [59] 张恨水. 散文与杂文——张恨水作品经典[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7.
- [60] 张恨水. 燕归来[Z].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 [61] 孙福熙. 绍兴通信[A]. 赵家璧主编, 周作人编选. 中国新文学大系(6): 散文一集[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 [62] 谢锡文, 许宗海. 夏津县志续编, 卷二·建置志·街市[M]. 1934.
- [63] 伍朝信. 汉口纪念孙中山的几条马路[A]. 武汉文史资料: 汉口忆旧(四)[Z]. 1996, (3).
- [64] 谢桂洲. 连州九街十八巷[A]. 政协广东连县文史委员会. 连县文史资料(9)[Z]. 1990, (2).
- [65] 桢和. 恩城街名沿革[A]. 政协广东省恩平市文史组. 恩平文史(4)[Z]. 1984, (12).
- [66] 野王(即董必武). 辟陈立夫“三民主义的中正论”[A]. 战旗(4)[J]. 1931-09-10. 钟离蒙, 杨凤麟主编.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 (2)7[Z]. 沈阳: 辽宁大学哲学系, 1982.
- [67] 唐希. 福建文化行旅[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2.

收稿日期 2007—07—18

作者陈蕴茜,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 映雪】

(上接第 56 页)

- [27] 户部纂辑. 光绪朝捐纳则例[A].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三编[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96.
- [28] 潘君祥, 顾柏荣. 买办史话[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29] 汪敬虞. 唐廷枢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30] 马敏. 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31] 甘作霖. 论洋行买办之利害[J]. 上海: 东方杂志, 第 16 卷 11 号(1919).
- [32] 徐润. 清徐雨之先生润自叙年谱[Z].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 [33]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 第 3 集[C].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 [34] 佛洛姆. 理性的挣扎[M]. 陈琍华译. 台北: 志文出版社, 1987.
-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6] (美)费维恺著. 中国早期工业化[M]. 虞和平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37] 李鸿章. 复沈幼丹制军[Z]. 吴汝纶编. 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Z].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3.
- [38] 李燕. 买办文化[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

收稿日期 2006—11—11

作者陈国威,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广东湛江教育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映雪】